

道德认同研究进展与德育启示*

曾晓强

(重庆工商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学院大学生发展研究所, 重庆 400067)

摘要:道德认同是指德行对自我的重要性,是联结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自我调节机制,是激发道德行为的重要动机。道德认同可以预测道德行为;人格、社会结构、家庭关系、朋辈关系、团体道德氛围、道德行动机会等因素影响道德认同的发展。道德认同研究显示,道德教育应重视家庭德育功能、营造学校道德氛围、引导积极朋辈关系、拓展道德实践机会。

关键词:道德认同;人格;社会结构;家庭关系;朋辈关系;团体道德氛围;道德行动机会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1)04-0150-06

科尔伯格代表的道德认知研究传统一直是道德心理学的主流,这种传统把道德认知视为道德行为的决定性动机,认为道德判断可直接引发道德行为;尤其在道德认知发展的较高阶段(如后习俗水平),道德原则意味着无可回避的道德责任。实际上,这种道德认知决定论并未获得经验研究与日常观察的支持。在道德生活领域,知行不一致的现象比比皆是。纵观道德认知的经验研究,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仅显示出较小程度的相关^[1];此外,对道德榜样的研究发现,道德榜样的道德推理水平与普通人并无显著差异^[2,3]。因此,道德认知因素充其量只能对道德行为做出有限的说明。国外的道德认同研究正是在批判和超越认知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涌现出来的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对道德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极富启发意义。

一、道德认同的内涵

“道德认同”即 moral identity,又译作“道德同一性”。参考社会科学界对 identity 的通常翻译,本文把 moral identity 译作道德认同^[4]。布拉西(Blasi)是道德认同研究取向的奠基者,对道德认同的内涵及动力机制做了最精致的说明。他认为,道德认同意味着个人的道德系统(moral systems)和自我系统(self systems)的同化或融合,以至道德观念(sense of morality)和个人认同(sense of identity)达到一定程度的统合^[5]。其他主要研究者对道德认同的界定通常派生或近似于布拉西的阐述。哈特等人把道德认同界定为“对促进或保护他人福利的行动路线的一种自我承诺”^[6]。达蒙认为,道德认同意味着“用道德原则界定自我”^[7]。阿基诺、里德把道德认同界定为“围绕一套道德特质而组织起来的自我概念”^[8],也常常把道德认同描述为“道德的自我重要性”(moral

* [收稿日期]2011-03-27

[基金项目]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9JY10)“重庆大学生道德认同状况及培育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0YJC880011)“高校生活德育模式研究”

[作者简介]曾晓强,男,讲师,博士,重庆工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学院大学生发展研究所教师。

self-importance)。哈代在其研究中把道德认同定义为“道德品质对于个体认同的重要性程度”^[5]。比较并综合上述界定,可把道德认同定义为“德行(morality; being moral)对自我或认同的重要性程度”。或许这个定义未必能涵盖道德认同的全部内涵,不过它反映了前述种种界定的共同之处,因而至少揭示了道德认同的核心或重要内涵。

二、道德认同的作用机制

以布拉西为代表的道德认同研究者认为,道德判断并不能自动引发道德行为,责任判断(responsibility judgment)是连接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的必要环节,即唯有人们认为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时,道德行为才最有可能被选择。布拉西认为,道德认同是形成责任判断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道德价值对于一个人的自我或认同非常重要,那么他/她就会感到一种高度的道德责任去实施道德行为。因此,道德认同是道德判断转化为道德行为的重要的自我调节机制,是激发道德行为的重要动机。

布拉西拓展了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理论,用以说明道德认同对道德行为的动力机制。自我同一性(self identity),也译作自我认同,主要指自我统合感与一致感。自我同一性理论认为,适应良好的个体在进入青春期后会逐步形成自我同一性(或自我认同)。自我认同包含着理想自我的内容,对行为具有规范和引导作用。布拉西认为,人具有自我一致的倾向,即愿意过一种与自我概念(sense of self)相一致的生活。这意味着道德认同规定并激发道德行为,否则会产生自我不一致感。随着自我同一性的发展,自我会发生如下变化:(1)自我概念越来越以内在的、心理的认同内容(如价值、理想)为基础,而不是以生理特征、人际关系、行为等外在认同内容为基础;(2)自我的组织化和统合度更高,认同内容被分层组织,某些认同内容(如道德价值或其他价值)成为自我概念的核心;(3)自我被赋予了更大的能动性,自我一致的倾向更加强烈^[1]。总之,随着自我同一性的发展,道德认同有可能获得更大的自我重要性,成为道德行为的主要动机。

不过,道德认同只是自我的社会认同的内容

之一。从广义上讲,社会认同即社会角色认同(群体成员身份亦可视为社会角色),是指个体对自身扮演的社会角色所承载的期望、规范、价值、理想的遵循和内化^[9]。据社会认同理论,自我是一种社会建构,是各种角色认同的总合;自我认同(self identity)是多维的层级结构,包括性别认同、职业认同、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道德认同等各种社会认同,它们构成了个体的社会自我图式(social self-schema)^[10]。各种认同的地位或重要性可能不同,道德认同的自我重要性差异(即道德认同水平)反映了道德认同在社会自我图式中的地位。道德认同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建构,因而一方面,由于个体经历差异和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道德认同表现出历时的发展性和变动性;另一方面,道德认同的激励作用在不同的情境中可能出现暂时波动,比如,一个拥有较高道德认同的人在特定情境下(面临重大威胁、不公或诱惑)也可能不选择道德行为^[11]。总之,道德认同呈现出稳定性和波动性的二重性,其发展和维持需要支持性的社会环境作保障。

三、道德认同的测量

(一)道德认同量表(Moral Identity Measure, MIM; Aquino, & Reed, 2002)

该量表是阿基诺、里德开发出来的,测量道德认同的自我重要性;包含内在化(Internalization)和表征化(Symbolization)两个维度(各五题),其中内在化维度涉及“道德品质或做一个道德的人对自我的心理重要性”,表征化维度涉及“希望把道德品质表现出来的程度”。测量程序如下:首先呈现九个代表性的道德特质(关爱、同情心、公正、友好、慷慨、助人、勤奋、诚实、善良),让被试想像具有上述品质的人的思想、感受和行为(以唤起被试有关“道德人”的心理图式);然后让被试对十道测题进行里克特七点评分,如“做拥有这些品质的人对我很重要”(内在化测题之一)、“我积极参与那些能让别人知道它具有这些品质的活动”(表征化测题之一)等^[8]。不过,无论是概念操作化还是效度分析结果都显示,内在化维度更符合道德认同的定义。

(二)道德自我关联量表(Moral Self-Rele-

vance Scale, or Adapted Good-Self Assessment; Barriga, Morrison, Liau, & Gibbs, 2001)

基本程序是提供八个道德品质和八个非道德品质词,让被试在里克特量表上分别评定上述品质对自我的重要性,道德自我关联量表总分为道德品质总分减去非道德品质总分。此外,普拉特(Pratt)等人应用的道德自我量表(Moral Self Scale)其测量逻辑完全相同,只不过道德品质和非道德品质词变更为各六个^[1]。

四、道德认同激发道德行为的经验证据

国外已有一些研究揭示出道德认同和道德行为的密切关联,为道德认同的动机力量提供了经验证据。科尔比(Colby)、达蒙(Damon)发现,成人道德榜样(由学者、神学家、宗教领袖提名)拥有高度的道德认同,即自我概念和道德目标高度融合;哈特、弗格利(Fegley)发现,与一般青少年相比,青少年道德榜样(由社区领袖提名)更多地使用道德词汇(如诚实)描述自我,赖默(Reimer)等人有类似的发现。此外,门罗(Monroe)对纳粹大屠杀时期的犹太人庇护者的研究也展示了道德认同的重要影响^[1, 12]。

阿基诺、里德等人发现,道德认同与大学生自我报告的志愿服务行为(帮助弱势者和适应不良者)显著正相关,与高中生的实际捐赠行为显著正相关^[8];道德认同有助于消除群体区隔,能预测对外部群体成员更为积极的态度和行为^[10];道德认同能降低对恐怖分子的非人道态度^[13];他们还发现,道德认同与商业欺诈显著负相关;道德认同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倾向于为慈善活动贡献私人时间而不是金钱,而组织地位较高的个体则更倾向于贡献金钱而不是时间^[1, 12]。此外,阿诺德(Arnold)发现(1993),青少年的道德认同与教师评定的道德行为显著正相关;普拉特(Pratt)等人发现(2003),青少年的道德认同与社区参与(如捐款、助人、政治参与、志愿服务等)显著正相关;巴里加(Barriga)等人发现(2001),晚期青少年的道德认同与反社会行为显著负相关^[1];沃夫拉发现,大学生道德认同与学术作假行为显著负相关^[14];哈代发现,即便在控制了亲社会推理和亲

社会情感之后,亲社会认同对亲社会行为仍有显著的预测力^[5];雷诺兹发现,道德认同与道德判断对道德行为有相对独立的影响^[15]。这些研究表明,道德认同的确是影响道德行为的重要因素。

五、道德认同的影响因素

(一)人格因素

哈特发现,青少年道德榜样的责任感水平显著高于比较组;儿童期的人格特征可以预测青少年期(10年后)的志愿服务参与水平,人格较富弹性的儿童比过度抑制型和低控制型儿童在未来更有可能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此外,针对成人的横断研究也发现弹性人格同参与志愿服务显著相关^[3]。沃克(Walker)等人发现(1999, 2004),道德榜样的责任感和宜人性特征最突出;在三种道德榜样中,勇敢榜样的外倾性特征最强,关怀榜样的宜人性特征最强,公正榜样的责任感和经验开放性最突出^[16]。

(二)家庭关系

哈特发现,青少年道德榜样对自我的描述与对母亲的描述相似度更高,显示母亲对青少年道德认同可能有重要影响^[3];认知和社会资源丰富的家庭环境,尤其是高水平的亲子共同活动可预测社区志愿服务^[6]。科尔比等人对成人道德榜样的研究(1992)也提示家庭环境,如养育风格,对道德认同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其它一些研究也为家庭关系影响道德认同发展提供了间接支持。罗森汉(Rosenhan, 1970)发现,参加早期公民权利运动的积极分子同父母的关系更为积极,父母为这些积极分子的儿童时代提供了利他行为的持久示范;伦敦(London)、奥利纳(Oliner)发现(1970, 1988),拯救犹太人的基督徒倾向于表现出对父母(至少其中一个)的强烈认同,父母被视为道德行为的榜样^[3]。Kochanska等人(1995, 2004)在其道德发展模型中提示,道德认同的发展很可能源于儿童与父母的积极联结即安全依恋经验;类似地,克拉克(Clark)发现(2000),亲子间的强烈联结感培育了儿童的“亲社会-共情”取向^[12]。布赫对澳大利亚、德国青少年(10~18岁)的调查显示,青少年更多地提名父母、兄弟姐妹等关系亲密者(而非媒体明星)为认同的榜样,

而榜样对道德认同发展有重要影响^[17]。

(三) 朋辈关系

戴维森(Davidson)、尤尼斯(Youniss)认为(1991)平等和合作的朋辈关系有利于儿童和青少年发展自律道德;类似地,凯勒(Keller)、埃德尔蒙斯坦(Edelstein)认为(1993)朋辈互动能促进儿童对自身行动的社会和道德意义的理解,有助于发展道德自我责任感^[1]。巴里(Barry)、温策尔(Wentzel)发现(2006),当朋友之间存在较强情感联结且互动频繁时,朋友的亲社会行为能影响个体自己对道德目标(比如助人与合作)的追求^[12]。达蒙认为,朋辈互动对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发展极为重要,因此积极的朋辈关系可以促进道德成长^[7]。

(四) 社区或团体道德氛围

鲍尔(Power)扩展了(2004)布拉西关于道德认同的观点,认为自我并不是孤立地经验到行动的义务和责任,而是在某种文化环境(cultural setting)中同他人一起经验到义务和责任;个体对团体及其共同规范的认同会形成一种“道德氛围”,这种或积极或消极的道德氛围可以促进或削弱个体道德;道德认同涉及团体认同以及对团体价值规范的共同承诺^[12]。总之,班级、学校以及其它团体和社区的良好道德氛围对青少年的道德认同发展有重要影响。科尔比认为支持道德的校园文化对道德发展至关重要^[2];达蒙等人甚至提出青年纲领计划(Youth Charter),意图在包括学校、社团在内的整个社区形成对青少年一致的道德规范和期望,以促进青少年道德认同的形成^[18]。

(五) 社会结构

哈特发现,社区或家庭收入水平对青少年志愿服务活动(作为道德认同指标)有一定的预测力,此外,儿童与青少年在社区中的人口比例对志愿服务有影响:社区收入水平低,则较高的儿童青少年人口比例会降低志愿服务活动水平;社区收入水平高,则较高的儿童青少年人口比例会提高志愿服务活动水平。此外,家庭收入水平、教育水平与成人的志愿服务存在正相关^[3]。性别、种族对青少年志愿服务也有一定的预测力:女性、白人的志愿服务水平较高^[6]。

(六) 道德行动机会

道德认同和道德行为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尤尼斯等学者认为,尽管道德认同可以激发道德行为,但是道德行为也可以发展和巩固道德认同,从发展的视角看,德行(morality)与认同(identity)互为因果、相互促进^[19]。尤尼斯等人对青少年社区服务的民族志研究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支持,发现参与社区服务可促使青少年反思社会的政治组织与道德秩序以及个体在其中的能动作用,有助于青少年发展社会历史感、认同超越性价值与理想,进而形成公民与道德认同^[20, 21]。普拉特(Pratt)等人在一项纵向研究中发现(2003),在控制了时间点1的社区服务参与水平后,时间点1的道德认同水平对时间点2的社区服务没有预测力;但在控制了时间点1的道德认同后,时间点1的社区服务对时间点2的道德认同仍有预测力,该结果为尤尼斯的观点提供了支持^[1]。哈特也非常强调道德实践机会对形成道德认同的重要作用,他与其同事的研究显示:对社区服务或志愿服务的参与、社区组织或团体成员身份(如青少年服务机构、俱乐部、教堂等)对青少年未来的政治参与和道德行为有积极影响,可促进道德认同的发展^[3]。

(七) 道德认同形成的整合模型

哈特对道德认同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做了最为系统的思考,构想出道德认同形成模型,如图1所示^[3]。其中,人格、社会结构是背景性的、相对稳定的、不可控的两个因素,对道德认同的形成有直接和间接影响;道德认知、自我-认同(self & identity)、道德行动机会是影响道德认同形成的直接的、相对可塑的、相对可控的三个因素,也是人格和社会结构影响道德认同的中介,而且三者与道德认同存在交互因果关系。与尤尼斯一致,哈特尤其强调为儿童、青少年提供道德行动机会对于培养道德认同的重要意义。该模型对于系统地思考和分析道德认同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和经验结果可以发现,人际关系的道德特征或氛围对个体道德认同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家庭关系、朋辈关系、社区或团体

道德氛围从本质上讲都可归结为人际关系的道德特征,道德行动机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参与道德性人际关系的机会。社会结构宏观方面得通过具体的人际互动才能对道德认同的形成产生影响。道德实质上是调节社会—人际关系的规范,

道德认同意味着个体在具体的社会—人际关系中通过社会学习机制将道德规范内化,因此社会—人际关系的道德特征或氛围对道德认同的形成有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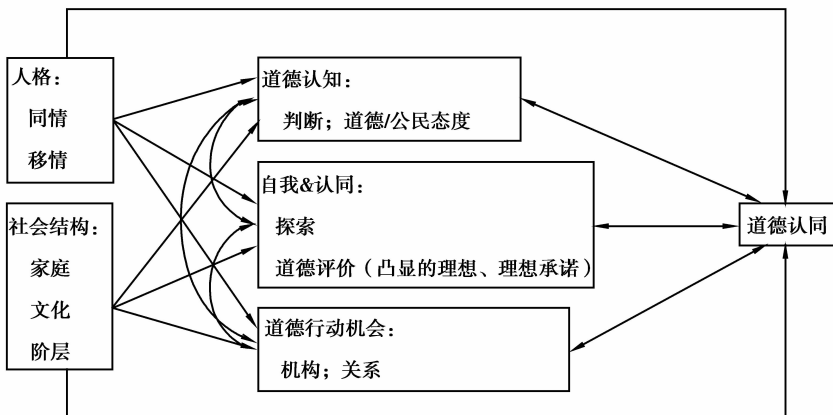


图1 哈特的道德认同形成模型

六、道德认同研究对道德教育的启示

根据道德认同理论,道德认同是形成责任判断的基础,是激发道德行为的重要动机,因此道德教育的核心目标应该是培育个体的道德认同。布拉西认为,就道德认同的养成而言,至为关键地是培养三方面的品质:(1)道德需要(moral desires)、(2)自我控制(self-control)和(3)诚实(integrity)即自我忠诚。其中,自我控制和诚实这两种品质是相对中性的,原则上可以服务于各种或积极或消极的意志(意愿)的追求和实现;而道德需要作为一种社会性需要,是一种次生意志(second-order volition,区别于本能或原生意志),它自我控制和诚实定向;一旦个体发展出的道德需要获得了自我控制和诚实这两种品质的支持,那么个体就能形成强烈的道德认同。正如前文所述,道德认同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建构。无论是道德认同本身,还是道德需要、自我控制和诚实等相关个性品质的养成,其基础均植根于个体成长所置身的社会—人际关系^[12]。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际经验都表明,家庭关系、学校氛围、朋辈群体、道德实践是培育道德认同、实施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

(一) 重视家庭德育功能

家庭生活是儿童发展个性与社会性的温床,家庭生活经验尤其是亲子关系对儿童德性养成至关重要。拥有良好亲子关系的儿童更为信赖、尊重父母,从而更倾向于遵从父母的期望和要求,这

最终有助于社会道德的内化。因此,充满关爱的家庭氛围、父母的言传身教是实施道德教育的基本途径,对儿童德性养成具有深远影响。

(二) 营造学校道德氛围

学校是个体成长的重要生活领域,能否营造出关爱、公正的学校道德氛围是学校道德教育成败的关键。正是基于这种理念,科尔伯格等人提出并实施了把学校建设成“正义社群”(just community)的道德教育方案,试图通过学生对学校公共事务的民主参与和群体决策促进学生的道德发展。总之,把道德的知识教育扩展为道德的生活教育是学校道德教育的必由之路。

(三) 引导积极朋辈关系

相互平等、彼此尊重、互助互惠、协商解决分歧等积极的朋辈交往经验对个体道德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家长和教师对儿童在朋辈交往方面的支持和辅导有助于其道德成长。

(四) 拓展道德实践机会

道德行动可以发展和巩固道德认同,只有通过道德实践本身才能实现道德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的统一。因此,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的道德教育都应该为被教育者提供充分的道德实践机会,鼓励和强化关心、分享、助人等亲社会行为,提供更多的志愿服务和社区服务的机会,让其在道德实践中获得积极的道德体验,促进道德内化。

[参考文献]

- [1] S. A. Hardy, G. Carlo. Identity as a source of moral motivation [J]. *Human Development*, 2005, 48: 232-256.
- [2] A. Colby. Moral understanding, motivation, and identity[J]. *Human Development*, 2002, 45: 130-135.
- [3] D. Hart.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identity[C] // G. Carlo, C. P. Edwards.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Vol. 51: Moral Motivation through the Lifespan: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5: 1165-1196.
- [4] 赵志裕, 温静, 谭俭邦. 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香港回归中国的研究范例[J]. *社会学研究*, 2005(5): 202-227.
- [5] S. A. Hardy. Identity, reasoning, and emotion: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three sources of moral motivation [J]. *Motiv Emot*, 2006, 30: 207-215.
- [6] D. Hart, R. Atkins, D. Ford. Family influences on the formation of moral identity in adolescence: Longitudinal analyses[J].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1999, 28: 375-386.
- [7] W. Damon. The mor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J]. *Scientific American*, 1999, 281 (2): 72-78.
- [8] K. Aquino, A. Reed. The self-Importance of moral identit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3: 1423-1440.
- [9] 周晓虹. 认同理论: 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J]. *社会科学*, 2008(4): 46-53.
- [10] A. Reed, K. Aquino. Moral identity and the expanding circle of moral regard toward out-group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4: 1270-1286.
- [11] D. Hart. Adding identity to the moral domain[J]. *Human Development*, 2005, 48: 257-261.
- [12] D. K. Lapsley. Moral self-identity as the aim of education[C] // L. Nucci, D. Narvaez. *Handbook of Moral and Character Education*.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8: 1-21.
- [13] K. Aquino, A. Reed, S. Thau, et al. A grotesque and dark beauty: How moral identity and 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fluence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reactions to war[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7, 43: 385-392.
- [14] S. A. Wowra. Moral identities, social anxiety, and Academic dishonesty among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J]. *Ethics & Behavior*, 2007, 17: 303-321.
- [15] S. J. Reynolds, T. L. Ceranic. The effects of moral judgment and moral Identity on moral behavior: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moral individual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7, 92: 1610-1624.
- [16] 王云强, 郭本禹. 当代西方道德人格研究的两类取向[J]. *心理科学进展*, 2009(17): 784-787.
- [17] A. A. Bucher. The influence of models in forming moral ident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98, 27: 619-1627.
- [18] W. Damon, A. Gregory. The youth charter: Towards the formation of adolescent moral identity[J].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1997, 26: 117-130.
- [19] J. Youniss, M. Yates. Youth service and moral-civic identity: A case for everyday morality[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1999, 11: 361-376.
- [20] M. Yates, J. Yoiiniss. Community service and political-moral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J].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996, 6: 271-284.
- [21] 陈会昌, 谷传华, 秦丽丽, 苑宏健. 尤尼斯道德发展的实践活动观述评[J]. *心理科学*, 2004(27): 156-158.

(责任编辑:朱德东)

Research Progress in Moral Ident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Moral Education

ZENG Xiao-qiang

(*Research Institute for Undergraduate Development, Schoo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Moral identity refers to the centrality of morality to the self, is self-regulatory mechanism connecting moral recognition and moral action, and is important motivation of moral behavior.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moral identity could independently predict moral action, and that personality, social structure, family relationship, peer relationship, moral atmosphere of community, and opportunity of moral action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of moral identity. Moral identity research implied that moral educatio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family moral education, create moral atmosphere of school, guide positive peer relationship and expand opportunity of moral action.

Key words: moral identity; personality; social structure; family relation; peers relation; group moral atmosphere; moral behavior opportunity